

16-21世紀澳門葡語文學概述

李淑儀*



澳門地方雖小，但由於歷史緣故，不少葡萄牙的文人墨客曾在此短暫居留，甚至在澳門度過一生，由此留下了不少描摹澳門風物人情的作品。本論文從歷時性入手，選取略具代表性的葡語文學作品，透過歷史上可能留存下來的文本或中介資料，參照澳門歷史脈絡進行比較，並透過文化解讀，從葡語作家對澳門四百多年社會發展的各種主觀感受和文學性的審視記錄之中，加深我們對澳門具有世界近代史意義的歷史—文化的深層認識。

*李淑儀，廣州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少時在澳門天主教學校接受中小學教育，後留學法國、葡萄牙和臺灣，諳熟中、英、法、葡等語言。曾任澳門大學、澳門歐洲研究學會有關語言、文化和文學等課程導師，也是澳門行政暨公職局培訓導師；曾任職於澳門文化局，負責出版研究工作，現任職於澳門中央圖書館，專責研究外文古籍；近年協助葡萄牙作家晴蘭（Fernanda Dias）將多本中文詩作譯成葡萄牙文：*Poemas de uma Monografia de Macau*, *Goa Ge Poemas*, *Poemas de Shu Wang*。

澳門四百多年以來用葡萄牙文寫成的作品相當豐富。從初期來華的傳教士，到中期從葡萄牙政權派來澳門視察的紳貴和代表其祖國管治澳門的官員，以至現代自由往來澳門工作的專業人員和文人雅士，都為澳門這個小城留下他們寶貴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可以分為八大類：報告文學、遊記、日記、詩詞、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華文作品的改編和翻譯。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來澳門的葡萄牙人的身份職業和當時中葡所處的歷史背景。

16-17世紀傳教士視野裡的中國觀

16和17世紀來澳門的葡萄牙人以傳教士居多，他們是當時澳門極少數具有寫作能力的人士。在中西文化相遇的初期，能夠真正瞭解中華文化的外國人並不多，而有關記載的書籍更少。因此，西洋人將澳門當作中國。來華的洋人多以傳教為目的，為着爭取其祖國宗教機構的認同，他們都會以美化的筆觸，用聯想將中國描繪成為國富兵強的烏托邦，但同時又以西方宗教觀去看待中國，把它形容為一個褻瀆西方神靈、精神文明相當落後的國度，此類文章特別多見於16和17世紀的伊比利亞文學作品中。

洛瑞羅教授認為：載於書信和手抄報告中的信息廣泛傳播，經常被編年史家和文學家所

利用，以各自的方式描述那些僅有輪廓的形象。

通過澳門這個中間站（澳門這個得天獨厚的觀察站至1583年已有兩千多居民，並已對廣東政府獲得相對自主的地位），耶穌會神父們扮演了半官方情報員的角色，源源不斷地向葡萄牙提供關於中國的資料，這些資料經常被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文學所利用。令人好奇的是，儘管許多過去幾十年觀察的缺陷都被修正，但欽佩的基調在耶穌會神父的文稿中依然保持不變，神父們在中國文明中又發現了新的欽佩原因：從帝國遼闊的疆土到引人注目的政治和行政結構，以及在某些生產領域的技術進步，恰如其份的古老習俗和令人羨慕的普及教育體系。

在孟三德神父（Duarte de Sande）所著的《日本天王遣歐使節團》（*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澳門，1590）一書中有很長的一章涉及中國。這本書首開先河，收入了一些利瑪竇神父不久前收集到的新東西，開始形成“天國”的新形象，一個更有依據、更為嚴謹但依然積極的形象。其它出版物很快幫助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播這種形象，其中許多出版物是耶穌會的，因為耶穌會傳教士一方面按規定利用與中國接觸的專有權加深自己的瞭解；另一方面，他們也未忽略通過一個精心設計、高效的年報系統定期向其歐洲教友們傳遞消息。⁽¹⁾

筆者選取了較為人熟悉的《遠遊記》（*Peregrinação*）為例（里斯本，1614出版）。作者費爾南多·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 1510-1583）說那是他的親身經歷的故事。然而據考證，有關該著作的全部內容卻是引用1583年（即這位著名旅行家逝世那年）以前流傳於葡萄牙的有關中國的傳說資料。他巧妙地按當時教廷的喜好來描繪中國，以求取得教廷的批准出版。

在書中，作者以自己的宗教觀來看待和解釋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對廟宇的神像描述多帶貶意，都被描寫成面目猙獰、令人望而生畏、難以形容、其醜無比、令人見之心驚膽顫（第109-

111章）。他心中的中國僧侶都是邪惡而導人迷信之徒，而佛門信眾更是大逆不道、作孽不淺的愚人。在他心目中，天主教是一個能為人類救苦救難的宗教（第21、91、99章），因此在平托等人遇難而解救他們的人皆為天主教徒。他認為天主教是優越的宗教，中國人應該放棄自己的信仰，改而信奉天主教。他還明確提出要使中國國王皈依天主教，他的子民才能成為天主教的信徒。唯有這樣，作者才能反映其要到中國傳教的迫切性。當然，所有謀害他的人也自然地都是異教徒。（第84章）

早期的西方人到東方來，對中國的反應有兩種基本態度。一是把中國描寫成理想的天國，平托出於他的天主教觀念，視中國人為異教徒，但與此同時，對中華帝國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秩序，卻又贊賞不已，並在作品中留下令人嚮往的“中國形象”。從第88章起作者乘船前往北京途中所見的城鎮鄉村，當中有很多具體的歷史、地理、人口、建築的描寫，大部分都是誇大其辭，這亦是當時（16世紀）外國人初次踏足中原自我想象出來的“世外桃園”。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作者將中國描寫如心中的“烏托邦”。事實上，1516年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思想的產生，是由於對當時英國政治不滿（英王亨利八世）而提出一套新的法律社會制度，在這套社會制度下，人民都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平托筆下的中國顯然是那個“理想國”，尤其是中國地大物博，建設規模宏偉壯觀，國家制度完善，可謂得天時、地利、人和的烏托邦。

18世紀筆下的澳門

到了18世紀，啟蒙主義抬頭，是資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確立自己統治的時代。科學的不斷進步使人們相信人定勝天，人已經不再是因原罪而被放逐到人間，而是大自然的主宰，迷信是人類苦難的根源，而科學是改變人類生活條件的唯



一出路。加上葡萄牙國王約瑟一世在1758年遭刺傷被傳是耶穌會士所為，導致澳門的聖保祿學院和聖若瑟堂受牽連而先後被封閉。又由於“禮義之爭”，清廷決定禁教，大批的傳教士被逐出中國，神權時代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傳教士的寫作事業遂被葡萄牙皇室派遣到中國和印度的葡國官員所取代，這些官員將澳門的實際情況毫無保留地表述出來。

葡萄牙詩人曼努埃爾·博卡熱 (Manuel Barbosa du Bocage) 在1789年10月至1790年3月曾旅居澳門。作為一個流放在外的歐洲人，對澳門這個流放地充滿疏離感。詩人面對澳門半島時，對葡國政府在澳門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質疑，同時顯現他對祖國文化的偏愛以及對其民族習俗規範的依戀，表現了一種不得不與異地異族發生某種關係的不平衡心理。他潛意識中是以本民族所居之地為核心，用本民族的文化眼光來考察、評論異地的事物。讀者可以從文德泉神父的著作 *Macau no Século XVIII* (書名意譯：18世紀中的澳門)，所錄博卡熱送給馬利亞·文妮斯的一首十四行詩瞭解他如何批評當時葡人在澳門的生活。

一個無權的政府，
一位某某主教先生，
一批幽居貞潔的修女，
三座修道院，五千個
不夠虔誠的土生男女和中國天主教徒。

一座十年如一日的教堂，
十四名身無分文的神甫，
到處都是貧困，到處都是卑賤的女人，
僅有百多個葡萄牙人住在一個不清潔的
城牆裡。

六座砲臺，一百個士兵，一面鼓，
三座用木來裝飾的教堂，
一個無起訴人的宗教裁判庭。

兩所修院，其一破壞不堪，
一所享有無上權力的議事庭，
葡萄牙在澳門就剩這麼多啦！

19世紀的中國熱

19世紀的歐洲經歷了連場的資產階級革命，參與其中的有商人、企業家、軍人和貴族。他們的共通點就是：都是具有文化修養的人。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來自閱讀外國書籍，其主要理論核心是反對皇權，憲法才是民族至高無上的權威。其時，這些有學識有思想的人士由於有能力及有財力，得以越洋過海來到東方尋找他們的夢想。當時清朝開始衰落，中國也和其他具有殖民野心的國家一一開戰，為此澳門和香港先後成為葡國和英國的殖民地。此後來澳門的葡萄牙人已不局限於軍職人員，他們有文職的外交官員、律師和教師等。這些人士的作品，多以寫實的遊記、日記為主，至於文學性的“詩”也偶然有之，而華文作品的改編和翻譯也開始出現。其時葡萄牙不時舉辦“殖民地文學獎”，鼓勵了不少來澳門的官員從事文藝創作，小說和散文也加入澳門的葡語作品系列。

隨着印刷術及航海技術的發達，外國與中國也開始較前兩個世紀有了更多接觸，亦因為中國被迫對外開放港口，葡萄牙作家對中國和澳門的描述漸趨真確。雙方語言障礙雖然存在，但經過傳教士的譯述，外國人對中國開始有不同程度的認識，因而使這些東方作者逐漸失去了以專家自居的優越性。每一個到東方旅遊或短期居住的歐洲人士都會按自己的觀感去定義東方，將東方的所有特色編輯成一連串瑣碎軼事，建立一個美學形式的東方。加上葡萄牙政府舉辦“殖民地文學獎”，更促使了不少來澳門的官員從事文藝創作，其中埃米利奧·桑布魯諾 (Emílio de San Bruno, 1871-1954) 和雅伊海·多·恩索 (Jaime do Inso, 1880-1967) 的作品就屬於這一類別的表表者。



桑布魯諾 (Emílio de San Bruno) 的筆名為飛利浦·埃米利奧·德·派瓦 (Filipe Emílio de Paiva)，1888年入伍成為海軍官員，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海外服役，為此得以撰寫多本文學作品。192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贊貝齊亞納》(Zambeiana)，該書在同年獲得殖民地文學會 (Congresso de Literatura Colonial) 二等獎。第二年，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 *O Caso da Rua Volong: Scenas da Vida Colonial* (書名意譯：福隆新街事件：殖民地的生活舞臺) 獲得殖民地文學一等獎，作品中的事件發生在澳門，從而成為第一部關於澳門的虛構作品。他逝世多年後，於1997年，才出版了 *Um Marinheiro em Macau - 1903: Álbum de Viagem* (書名意譯：1903年一個水兵在澳門：航行紀念冊)。這本書是有關他在澳門、香港、華南、太平洋沿岸和印度航行的回憶錄和日記，書中配以照片、繪畫、明信片、水彩畫等。

另一位被派來澳門服役又獲得“殖民地文學獎”的海軍官員是恩索 (Jaime do Inso)。1926年他被派到帝汶、澳門等地服役。作為一名海軍官員，他遊遍了世界各地，為他的創作和宣傳活動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和推動力。他發表和出版了數十種著作和無數篇文章，除了文學外，同樣多的作品還有涉及歷史、人種史、職業、旅行以及殖民地宣傳方面的論題。他的主要著作有：*Cenas da Vida de Macau* (書名意譯：澳門的生活舞臺)，1941年 (1997年第二版)；*O Caminho do Oriente* (書名意譯：東方之路)，1932年 (1996年第二版)；*Visões da China* (書名意譯：中國之觀察)，1933年；*China* (書名意譯：中國)，1923年。*Macau - A Mais Antiga Colónia do Extremo-Oriente* (書名意譯：澳門——遠東最古老的殖民地)，1929年；*A Colonização e o Problema do Oriente Português* (書名意譯：葡萄牙在東方的殖民化及其問題)，1934年。

19世紀，一種既像遊記又像小說的作品開始出現，這些作品的目的就如作者自己在序中所說

的那樣：“不是為了已認識東方的讀者而寫，更不是為了學者們，因為這部書《東方之路》(*O Caminho do Oriente*) 不會為前者帶來新的事物，也不會為後者帶來閱讀的樂趣……它的目的就是透過盡可能真確的‘聽和聞’，去重演葡萄牙人在其殖民地的生活……當中的人物不是由作者創造出來，但也不是為歷史傳記，祇是一幅我們在東方生活的草圖。”為此這本書在1932年出版後，就獲得了第四屆殖民地文學獎。

《東方之路》的作者以紀實性的筆調描述了兩個主角 (Rodolfo 和 Frazão) 一行抵達澳門的所見所聞，主要內容包括：澳門城市的新格局、澳門航道的分佈、中葡文化在澳門的存在及其影響、中國的民間習俗和宗教信仰等。書中描寫了華人社區的節日氣氛，特別是中國人對各種花卉的喜愛以及它們的文化含義，再現澳門街頭的賭館、寺廟的陳設以及朝奉情節，也描述了澳門華人生活及宗教習俗，勾畫了東方市集的商業景象，分析了澳門衰落的原因，強調了澳門的歷史特性，抒發了對澳門未來的希望和情感，訴說了西洋人對中國社會生活的接觸及感受。前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主席林寶娜在《東方之路》(1996年由前澳門文化司署再版)一書的序中，作了以下的評價：“這本書的文體可歸類為散文，它是存在於小說與專欄之間，也是一本畫冊，因為文中的細緻的描寫就好像將當時情景拍攝下來一樣為當時葡萄牙殖民地作了一個良好的宣傳……”

19世紀，“東方事物”已深入歐洲的民間，不再局限於君王貴族所擁有。讀者也不要忘記，這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葡萄牙開始進入共和國時期皇權逐漸歸還給人民有關。“東方文化”已於前三個世紀被神職人員、貴族及商人陸續地傳到整個歐洲。新的資產階級興起了新的愛好，因此不論精神上或物質上的“中國事物”(Chinoiserie)，都被葡萄牙人所接受並加以融合，再加以創新成為個人獨特的風格。當中庇山耶 (Camilo Pessanha, 1867-1926) 就是一個好例子。



庇山耶1867年出生於葡萄牙科英布拉，1926年歿於澳門，是在澳門罕見的葡國詩人，也是葡語作家象徵主義代表人物之一。他於1893年來澳門，擔任中學老師、律師，同時翻譯中文詩和自己創作詩。《滴漏》(Clepsidra)是他唯一的作品。現在，我們試從《滴漏》的中文譯本（陳用儀譯，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中揣摩中國詩對他創作的影響。這首〈路〉是庇山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一

我做着惡夢；病懨懨的心靈，
感到一陣說不出的餘悸。
我提心吊膽走在未來的浪尖上，
滿懷着對於現在的追憶。

邊追憶這個傷痛，又想使勁地把它
逐出自己的胸懷，但是辦不到。
祇好在日薄西山的迷矇中，
拿一塊暗紗把我的這顆心籠罩。

要是沒有傷痛，心就一無所有：
就像那剛剛升起就熄滅的太陽，
因此太陽祇有在清晨時才哭泣。

二

有一天你在路上遇見了我，
我在尋找甚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老兄，你好呀！”我向你打招呼，
孤寂一人走路越走會越漫長。

路漫漫，路漫漫，到處是荊棘！
你停下來歇歇，我也喘口氣……
你在一家小店駐腳，我也停了下來，
我們二人共飲一瓶葡萄酒。

到了那孤零零的崎嶇小山崗，
它那受難聖地般的岩石扎入雙腳，
又像沙漠一樣熱浪逼人……但就在那裡

我們各自為自己的傷痛而哭泣……
你的淚滴在咱們共飲的葡萄酒裡：
我們祇好喝下共同流出的淚水。

有趣的是，筆者檢得明代詩人邊貢的〈幽寂〉和宋代詩人柳永的〈雨霖鈴〉兩首詩，將它們作比較之後，就會感受到庇山耶的〈路〉和此兩首漢詩何其相似！庇山耶所表達的主題：“送別”所使用的時間：黃昏；地點：郊外；活動：二人對飲及意境：淒涼、孤寂、飲泣、追憶；都與中國古詩不謀而合：（邊貢）〈幽寂〉一詩如下：

幽寂耽蓬戶，淒涼懷舊吟。
鶯啼非故國，早色亂春心。
落日黃雲暮，陰風碧海深。
嗷嗷北來雁，二月有歸音。

（柳永）〈雨霖鈴〉一詞如下：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
都門悵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
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
念去去千里煙波，
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

我們再以庇山耶的〈憑弔禪房大院〉與唐代詩人常建的〈破山寺後禪院〉相比較：

〈憑弔禪房大院〉——

想當年田園風光，如今已成記憶，
——春光明媚，可惜好景不長……
修道院的晨鐘鏗鳴已隨歲月流逝！



——昔日熱鬧的寺院今天已一片荒蕪……

一切都已過去……銀蓮花、繡球花，
虎耳草——這些鮮花對我們多麼親切！
現在呢，禪房大院裡蕁麻盛開，
蛇蝎沿着古舊的石板蜿蜒。

下面是那麼蝕得難以辨認的名字！
——我的雙眼已經看不清上面的字跡，
眼睛已經疲倦……還有那消失了的芬芳

從你普普通通的名字那裡昇騰！
溫柔天真的墓誌銘啊，
靜悄悄的忘懷使這股芳香顯得更加高貴。

（常建）〈破山寺後禪院〉一詞如下——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但餘鐘聲音。

很明顯地，兩詩的時間：清晨；地點：破寺的禪院；意象：花、鐘聲、幽徑是很相近的。如果說底山耶的詩是直譯於中國詩，似乎有點過份，然而他無疑是吸取了中國古詩的意象和韻味，進行了再創造。而真正的譯詩，也就是一種“再創作”，因為不同語言之間的詩幾乎是不可翻譯的。對熟悉中國古詩的人，相信或可透過底山耶《滴漏》中各詩的命題找出與之相對應的中國詩。葡萄牙著名作家若瑟·奧古貝多·薩埃布拉（José Augusto Seabra）也對底山耶詩中的元素有如此看法：“如果說必須用底山耶形象顛峰的東方氣息選擇一種世紀末詩篇與世紀初傾向相結合的形象，那末就預示如同說對頹廢主義而言是一種‘新的復興’的來臨。他標誌着‘失去祖國’

的漂泊不僅是肉體上的放逐，同時也是詩歌本身的體驗。他以法國鮑德萊（Baudelaire）的模式去審視充滿奇幻色彩的東方，從而感覺到了‘西方的東方’的特點。”⁽²⁾

19世紀以來專門撰寫澳門事物的作家相對於以前增加了不少，當中有 Carlos José Caldeira (1811-1882), Francisco Maria Bordalo (1821-1861), Adolfo Loureiro (1836-1911), Wenceslau de Moraes (1854-1929), 阿爾諾索伯爵 (Conde de Arnoso) (1855-1911), Manuel da Silva Mendes (1867-1931), Emílio de San Bruno (1871-1954), Jaime Velho Cabral Botelho do Sousa (1875-1946), António Patrício (1878-1930), João Braz de Oliveira (1880-1950), Álvaro de Melo Machado (1883-1970), Abílio Augusto de Brito Nascimento (1885-1942), Francisco de Carvalho e Rêgo (1898-1960), Ferreira de Castro (1898-1974) 等。每位作家觀察澳門都有其獨特的角度，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20世紀的百家爭鳴

進入20世紀，葡萄牙和中國都發生了很多重要政治事件，從而影響着澳門的政治環境。1910年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翌年中華民國成立；1913年葡萄牙要求中國就澳門劃界展開談判，但世界大戰開始，國際形勢變得緊張而又複雜起來；1922年反對葡國繼續佔據澳門的民眾運動逐漸掀起；1929年葡萄牙右翼強人薩拉沙總理進行專制主義統治；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開始了艱苦而漫長的抗日戰爭，為逃避戰火，第一批難民逃到澳門（1939）；第二次世界大戰旋即開始，直至1945年日軍投降，抗戰勝利。1974年澳門結束葡萄牙殖民地式的統治，改為中國領土由葡萄牙代管，直至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作家自然有大量的寫作題材。踏入20世紀，由於教育普及化，人們的寫作能力大大提昇，掌握用葡萄牙語寫作能力的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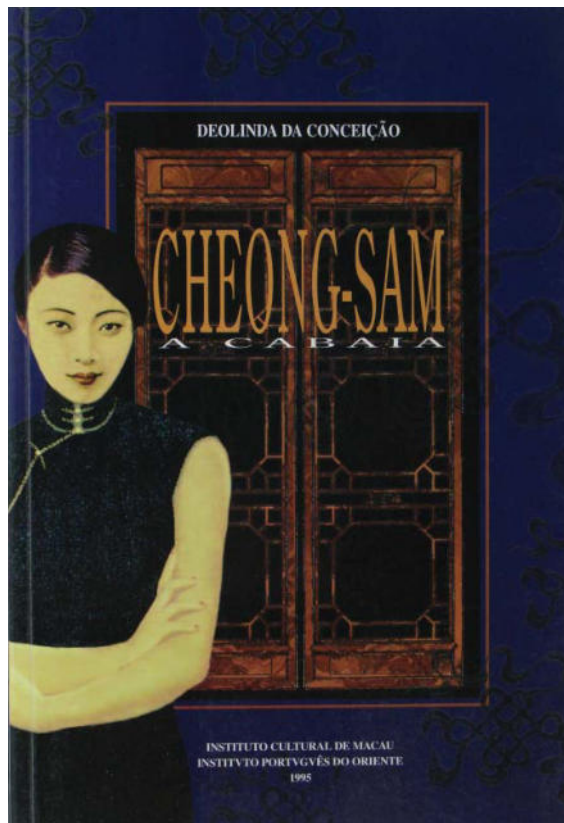
再局限於來自葡萄牙的人，也有來自葡亞混血的土生葡人。而澳門報業的普及也催化了記者的增多，在本澳報章上撰寫專欄的作家也加入創作隊伍。因此20世紀時期的澳門葡語作者和作品是最為豐富的。

一、土生葡人文學作品

土生葡人文學作家並不多，其創作語言分為葡萄牙語和土生葡語兩種。用葡萄牙語寫作的小說家有江道蓮 (Deolinda da Conceição, 1913-1957) 和飛歷奇 (Henrique Rodrigues de Senna Fernandes, 1923-2010)，詩人李安樂 (Leonel Alves, 1920-1980)。用土生葡語寫作的作家有：詩人阿德 (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1919-1993) 和土生話劇作家飛文基 (Miguel de Senna Fernandes, 1961-)。由於文藝創作的花朵已經化育多時，土生葡語已經脫離使用的實際功能，進而提昇為文化功能，有些土生葡人用口語化的土生葡語去作詩歌和演話劇。這類方言文學不但凸顯了本地獨有的歐亞語言的混合特性，也體現了色彩濃厚的澳門情懷。為此“土生葡語話劇”更在201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對土生葡語這類方言文學不做展述，而集中探討由土生葡人用葡萄牙語寫成的作品。

江道蓮 (Deolinda da Conceição, 1913生於澳門，1957歿於香港) 是澳門土生葡人文學界中僅有的女作家，曾在澳門天主教私立學校任教。和那個時期的土生葡人一樣，她也曾到上海和香港工作和生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她便返回澳門，加入了報館的工作，負責《女性副刊》(Suplemento Feminino)，在報上發表了大量的社論、文學和藝術評論、中國傳統和文化普及讀物、民間故事以及一些短篇小說。1956年，在里斯本的弗朗西斯科·弗朗哥書局 (Livraria Francisco Franco) 出版了她唯一的短篇小說：《Cheong-Sam, A Cabaia》，中文譯本《旗袍》，在1996年由澳門文化局出版。

《旗袍》中的二十七篇短篇小說，主要講述當時澳門和中國社會在戰亂饑荒下人民的生活苦



江道蓮作品《旗袍》封面

況，以及種族間的不平等的現象。當中有十四篇是以中國女性為題材，有大家閨秀、小家碧玉、低層的無名女子、奴婢、女工、情婦等等。她以女性為主角，寫出她們在傳統男權主導下的生活模式、女性經驗、美感、痛苦和快樂；細緻地描寫她們的身體、語言、心理等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揭露社會傳統觀念內化為人們自我的規範而令女性以為這是必然的和應該接受的。對於這些觀念，小說中的女性有的認同、有的反思、有的反抗，故而導致出現女性尋求擺脫依賴、尋求自我的呼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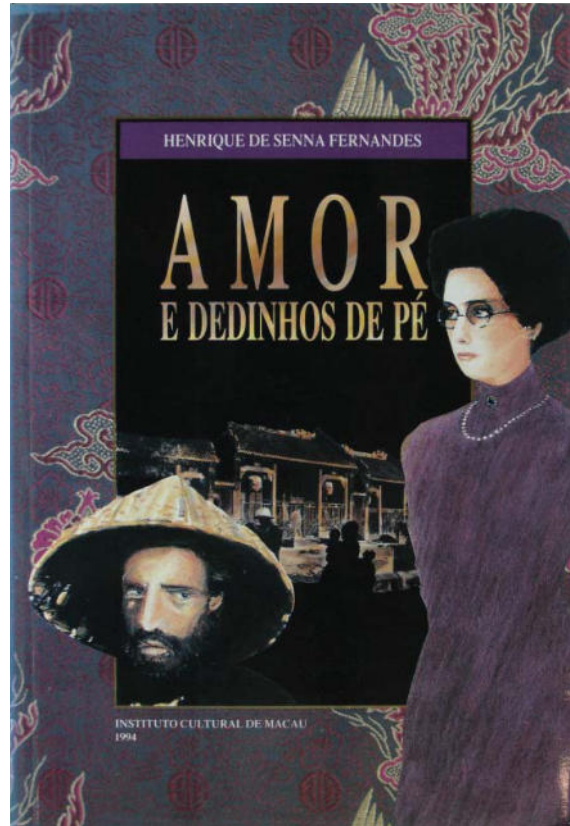
飛歷奇 (Henrique Rodrigues de Senna Fernandes, 1923-2010) 是澳門著名的歐亞裔小說家，在澳門唸完中學後，便擔任葡文官立小學的教師。太平洋戰爭結束後，他離開澳門前往葡萄牙修讀法律，1952年獲得科英布拉大學法學學士

學位。兩年後，飛歷奇返回澳門，除了先後任職律師、法官、檢察院代表等職務，也擔任多項社會職務如澳門教育委員會、文化委員會、律師公會的主席等。為此，他於1978年獲頒“公共教育勳章”，1987年被授予殷皇子勳章，1989年澳門總督重新確認他的文化功勳榮譽，1995年授予他澳門最高榮譽勳章（Medalha de Valor）。

飛歷奇年輕時就開始寫作。早在1950年（當時他還是學生），他的短篇小說〈蛋家女阿張〉就在科英布拉大學新生入學節文藝作品比賽中獲得“費阿略·德·阿爾梅達獎”。1973年，這篇作品被收入短篇小說集《南灣》（*Nam Van. Contos de Macau*）。飛歷奇於1986年和1993年分別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愛情與小腳趾》（*Amor e Dedinhos de Pé*）和《大辮子的誘惑》（*A Trança Feiticeira*）。這兩部作品先後於1994年和1996年出版了中譯本，亦被拍成電影。《大辮子的誘惑》也被改編成戲劇，由商業學校戲劇班在1997年年初演出。之後又被搬上了葡萄牙舞台，於1997年7月在里斯本的“巴拉克”劇場和基良斯演出。飛歷奇在回歸後四年繼續在澳門葡文報句號報（*Ponto Final*）發表他的長篇小說 *A Noite Caiu em Dezembro*（書名意譯“黑色十二月天”），但因小說尚未完成，故尚未出版。

飛歷奇自己有言，他的作品，是為了保留當年的記憶和反映葡國人在東方所產下的一個特異族群的事跡而寫作的。他透過葡萄牙男孩愛上中國女孩的一些愛情故事，反映兩個民族結合的思想和感情生活，探視新的族群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和障礙。作者利用故事的發展及主角所到之處，將當年的事物以及當時土生葡人的生活情景，活生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他筆下的50-60年代的澳門氣氛，象徵了他以文人身份的個人以至他的族人對澳門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認同和歸屬感。

飛歷奇的遺作《黑色十二月天》講述1941年12月6日日軍封鎖澳門的情況。作者利用雙線記敘法，一線講述當時的戰爭詳細狀況，另一線記敘 Belmares 土生葡人家族的悲歡離合。這種文體能



飛歷奇作品《愛情與小腳趾》封面

牽動同時存在和發展的兩條線索，以拓展作品的廣度和深度，借以表現多彩而複雜的社會生活。

飛歷奇由於親身經歷過太平洋戰爭下的澳門生活，而且記憶猶新，因此《黑色十二月天》以它為故事背景。那時期的澳門大門常開，各種族的人民從各地逃難到這座小城，人與人之間沒有種族區分，小說中所呈現的澳門是如此的真實自然，對於每個角色作出了細緻的描寫，文中所描述的情節如此接近生活，使讀者有如回到過去，深切體驗到活在戰爭時期的惶恐無奈，但同時又感受到那不分種族的大愛精神。如此感人肺腑，完全流露了飛歷奇熱愛生命的大愛精神。雖然這部小說由於飛歷奇的去世未完成，卻絲毫無損於作品的出色表現。

李安樂（Leonel Alves）是澳門土生文學的重要詩人。他生於澳門，父親是葡國人，母親是中



國人。由於父親很早去世，母親獨自承擔撫養四個孩子的沉重擔子，家境十分困難。他中學一畢業就去工作，後來服過兵役，往後一直在澳門衛生司工作，直到退休。晚年，李安樂埋首於研讀葡譯本的中國哲學著作，也在此時寫下了大量詩篇。1983年（澳門市政廳成立四百週年時），由他兒子歐安利律師首次將他的部分遺作結集出版，題名為 *Por Caminhos Solitários*（書名意譯“孤獨之路”）。李安樂用詩表達對故鄉的愛，對葡國的愛、對中國的愛，對自己和葡中兩國文化的血肉聯繫所表達的一切充滿無限欣悅。他在〈澳門之子〉中寫道：

永遠深色的頭髮，
中國人的眼睛，亞利安人的鼻樑，
東方的脊背，葡國人的胸膛，
腿臂雖細，但壯實堅強。

思想融匯中西，一雙手
能托起纖巧如塵的精品，
喜歡流行歌但愛聽 fados
心是中國心，魂是葡國魂。

娶中國女人乃出自天性，
以米飯為生，也吃馬介休，
喝咖啡，不喝茶，飲的是葡萄酒。

不發脾氣時善良溫和，
出自興趣，選擇居住之地，
這便是地地道道的澳門之子。

他在〈知道我是誰〉中寫道：

我父親來自葡國後山省，
我母親是中國道家的後人，
我這兒呢，咳，歐亞混血，
百分之百的澳門人！

我的血有葡國
猛牛的勇敢，
又融合了中國
南方的柔和。

我的胸膛是葡國的也是中國的，
我的智慧來自中國也來自葡國；
擁有這一切驕傲，
言行卻謙和真誠。

我承繼了些許賈梅士的優秀
以及一些葡國人的瑕疵，
但在某些場合
卻又滿腦子的儒家孔子。

(……)

確實，我一發脾氣
就像個葡國人，
但也懂得抑制
以中國人特有的平和。

長着西方的鼻子，
生着東方鬍鬚。
肯上教堂，
也進廟宇。

既向聖母祈禱，
又唸阿彌陀佛。
總夢想有朝能成為
一個優秀的中葡詩人。⁽³⁾

這些詩篇以流暢的音調、樸實無華的語言和熱烈真摯的情感表現了詩人一顆澳門之子的赤子之心，不僅成為其詩集的一大特色，也成為整體土生文學中的一個鮮明標誌。澳門土生與中國及中國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很多人本身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產物。因此他們對中國和中國文

化的感情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局外人”。像華人一樣，土生也拜關公、吃中藥，農曆初一往寺廟焚香和祝願，然後陪父母上茶樓，在這些日常生活習俗中滲透着對中國文化的“誠心投入”。

二、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作家

這裡主要介紹葡萄牙人的作品。他們分為兩個類別：一類是長期居住在澳門的作家，如賈樂安 (Rodrigo Leal de Carvalho, 1932)、郭棟樑 (António Correia, 1948-)、左凱士 (Carlos Morais José)、瑪利亞·翁迪納·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 1932 - 2003)、白姐麗 (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 1925 - 1992)、晴蘭 (Fernanda Dias, 1945 -) 等；另一類是應邀來澳門訪問的過客。

賈樂安 (Rodrigo Leal de Carvalho)，1932年出生於大西洋的亞速爾群島，畢業於里斯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在自己的家鄉擔任共和國檢察官，從而加入了法官行列，為此贏得了走遍葡萄牙往昔的各海外省的機會，先後到過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1958-1959)、澳門 (1959-1963)、幾內亞 (1963-1966)、澳門 (1966-1971第二次)、安哥拉 (1971-1973)、莫桑比克 (1976-1975)。1976年他又回到澳門，先後擔任過檢察長和助理總檢察長 (1976-1996) 等重要職務。賈樂安在澳門回歸前為審計法院院長。他前後在澳門居住了四十年，可以說是半個亞洲人了，非常熟悉本地情況，經歷了很多精彩的故事，為此撰寫了八本小說。其所有作品都以澳門為背景，不僅對澳門的自然風景作了深刻的描寫，而且以澳門作為其作品中人物和故事發展的真實舞臺，值得讀者們深入研究和關注。他的作品有：

第一部小說 *Requiem por Irina Ostrakoff* 1993年出版，中文翻譯本《還魂曲》，1999年出版。

第二本小說 *Os Construtores do Império* (書名意譯為“帝國的締造者”)，1994年出版。

第三本短篇小說 *IV Cruzada* (書名意譯為“第四次聖戰”)，1996年出版。

第四本小說 *Ao Serviço de Sua Majestade* (書名意譯為“効忠女皇”)，1996年出版。

第五本小說 *O Senhor Conde e as Suas Três Mulheres* (書名意譯為“伯爵大人與其三位妻子”)，1999年出版。

第六本小說 *A Mãe* (書名意譯為“母親”)，2001年出版。

第七本小說 *O Romance de Yolanda* (書名意譯為“玉蘭的愛情故事”)，2005年出版。

第八本小說 *As Rosas Brancas do Surrey* (書名意譯為“舒梨郡的白玫瑰”) 2005年在報章上發表，2007出版成書。

賈樂安的法官生涯使他具備了對各種人物和各種複雜環境的極其細緻入微的分析能力。澳門有他文學創作的素材，這塊彈丸之地是一塊容納各種不同文化、各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奇妙地方。賈樂安的小說展示了澳門歷史上這種不同人群的匯合及其和睦相處的種種複雜側面。他用特有的辛辣筆觸，剖析小說中各個社會代表人物的不同的道德行為。他的小說特別突出對上流社會的批判。所謂上流社會是指擁有特權的中外人士，包括有貴族爵位的知名家族成員、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僚階級和資產階級及其裙帶關係的既得利益者，當中也有包裝成名流紳貴的黑社會成員。賈樂安很熟悉生活在澳門的這個階層的外籍人士，他以寫實的筆觸描述上流社會的思想和價值觀，他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享樂主義；在動盪的年代，有的為了生存變成犯罪分子，流竄到他國，也有破落皇孫利用他們的貴族身份去騙取他人的信任，從而得以財色兼收。他講述了澳門在兩次世界大戰時期所發生的事，那時澳門正是流民的收容所，遭受各種不幸而來此避難的人們來自俄羅斯、葡萄牙、英國、上海、香港等地。

郭棟樑 (António Correia, 1948-) 寫詩也寫小說。他的詩集 *Amagao, Meu Amor*, 1992年出版；*Framentos* (《片思偶想》)，1994年出版。透過他的 *Contos de Ou - Mun* (書名意譯為“澳門短篇小說”)，講述了十六個中層葡萄牙人於60 - 70年代在澳門生活的故事。當中一些葡萄牙人與中



郭棟樑作品《澳門短篇小說》封面



左凱士作品《死亡是四個夜晚》封面

國人一起生活，他們如何共度中西節日、分享中葡廚藝，如何嘗試在兩種文化差異下抱有不同的價值觀而共同面對其艱辛、矛盾、多樣化的生活。

《今日澳門》葡文報 (*Macau Hoje*) 的社長左凱士 (Carlos Morais José) 寫詩也寫散文。《A morte são 4 noites》(書名意譯為“死亡是四個夜晚”)。透過葡萄牙成語“生命是兩天”(a vida são dois dias)，可以啟發讀者了解左凱士的“死亡是四個夜晚”的特別含意。葡萄牙成語“生命是兩天”意指生命的短暫。作者採用“死亡是四個夜晚”為書名，是否意味着快樂是短暫的，但痛苦是漫長的？作者在前言中亦說明這本書是一個“放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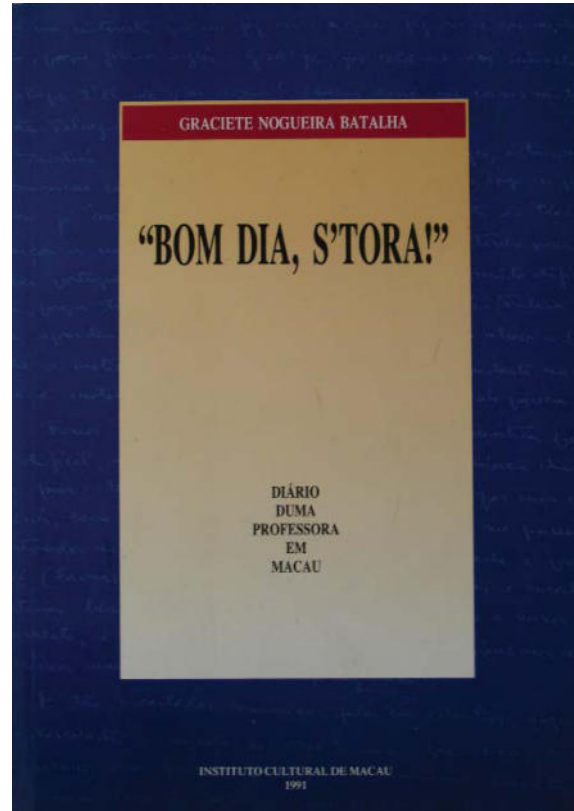
者的日記”，是一個“身在澳門心在葡”的流放者的心聲。本書以散文詩體出現：漫步、日落、颱風、夜生活、爵士音樂、空寂無人的大街、隱蔽小屋內的一段火辣情緣、冰冷的寒風等憂鬱的意象。有部分來澳門工作的葡萄牙智識分子，因為沒有學習漢語，無法投入澳門當地的生活，白天工作後，晚上就到酒吧去，借着酒醉三分醒，處處拿現在的澳門跟過去的歐洲相比，雖然身在澳門，卻仍然不認同這塊土地。這突現了人類遭遇挫折時的懦弱、不願面對現實，以及思鄉之情久久不能釋懷，導致那孤獨無援的感覺加劇，陷入無助的死胡同裡。

20世紀的澳門葡語文學當中，不可忽略身為教師的女性作家。她們的作品題材較前述的溫馨，可以領略到以女性的感受對葡人和華人在這片空間相逢的描述。

白姐麗（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 1925-1992）的 *Bom Dia, S'tôra*（書名意譯為“老師早安”）是一本教師日記。她1969年來到澳門，在葡文學校教授葡萄牙文學。書中不但紀錄了她與學生之間的課堂軼事，同時也探討中葡兩個族群的生活方式，對澳門這個中葡語言文化混合的教學模式應如何處理提供了寶貴的建議，內容非常豐富，值得細讀。

瑪利亞·翁迪納·布拉加（Maria Ondina Braga, 1932 - 2003）離開了祖國，足跡遍及東西方（印度果阿、中國、澳門，法國、英國），她將飄泊生涯的見聞記錄下來，在書中談到了“非洲的傷心土地”、“經過印度洋”、“澳門的日子”（第一次居澳的感受），二十五年的寄居感受，在內心深處總是同原始的空間即葡萄牙聯繫在一起的。其有關澳門的著作有：*Estátua de Sal*（書名意譯為“鹽巴塑像”），1969年；*A China Fica ao Lado*（中文譯本《神州在望》），1968年；*Nocturno em Macau*（書名意譯為“澳門夜曲”），1991年。這些作品體裁多樣，有自傳，有長、短篇小說。這位女作家杜撰一些故事，但講述的卻是真正的歷史和真正存在的人和事，當中有“我”，有“你”，有葡萄牙人（軍人、教師、修士、神話）、土生葡人（他們的生意、婚姻和糾葛）、中國人（男男女女、文字、傳說……），歷史限於記錄事實，而小說則反映各種社會心和人的靈魂。她的作品由於遍佈全世界尤其是遠東的葡萄牙人的細緻深入的分析，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鹽巴塑像》是一部“自傳式的長篇小說”，也是一部回憶錄，描寫了自傳中的“我”在葡國尚未出嫁時的生活歷史、浪跡天涯的歷史和寫作的日子。對這位女作家來說，澳門是啟示之地，是神秘的“邊緣地”，“到澳門來，正如說到中國來



白姐麗作品《老師早安》封面

一樣，是得到了一個也許是難得的機會，可以面對面地看到超自然的事物。”

《神州在望》是一組關於“纏足老婦、賣小玩意兒的小販、算命先生、漫無方向的女人”的故事，這些人物介乎真實與夢想之間，不安寧、悲慘、怪異、迷人。故事裡還有個“我”，同這些人物相逢、結伙。這一來“我”就不再“被邊緣化”，而是站到“裡面”去了。對愛情、對友誼的新認識、新道路，因身“在”澳門而感到愉快，那裡身“屬”澳門的感覺。

《澳門夜曲》是對一種有意的逾越、對吸引力發揮到極限時的結果即愛情與死亡的描寫。故事講的是一個葡萄牙女郎熱戀一名中國男子，她對中國“方塊字”入了迷，對現行的規則提出了挑戰。書中描寫不斷有各式各樣的航海者前來澳門，這些人由於各種原因被迫離開了自己的故土，經常害着“思鄉病”。這裡談到的是一處

有助於讓“我”向自己回歸的地點，這是一個港口，那些永遠的遊子們可以在這裡準備下一段行程，留下自己的根，帶走日後用得上的“食糧”。男主人公同時被兩個女人愛上，一個是葡萄牙女人，一個是中國女人，而澳門也和這位男主人一樣，介於中葡之間。澳門的特性會保存下去嗎？小說人物之一的離去、另一個人物似乎對此不在乎的態度，三角關係的打破，難道會毀掉那靠“難得糊塗”而生存下來的主體嗎？也許有那麼一天，兩個為此不同又為此接近的女人，會恢復彼此的聯繫，能自由地、安全地、有福同享地、透明地生活在三人之愛當中。

布拉加的作品顯示了一種對澳門的特殊看法，是帶有某種憂鬱、被邊緣化的“放逐者”。這是由於看到“我”（葡國人）的命運，看到一個城市的命運，而感到一種“傷感的頓悟”。於是就有了烏托邦，有了在歷史面前有所作為的意願，有了一種對“普世博愛文明”的憧憬、對一個沒有孤寂感的空間的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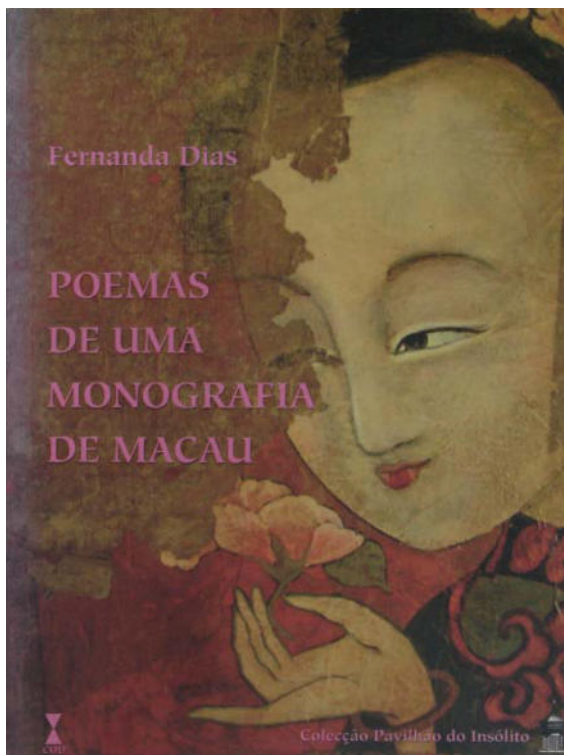
晴蘭（Fernanda Dias, 1945-）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教師。她在1987年來到澳門，在葡文學校教授視覺藝術。由於晴蘭年輕時就開始寫作和喜愛中國文化，所以她寫詩也創作短篇小說，同時也翻譯大量中國作品。晴蘭擁有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圖像變化為文字，所以她的詩真的做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她的著作有1998年出版的 *Horas de Papel*（書名意譯為“紙上時光”），1998年出版的 *Dias de Prosperidade*（書名意譯為“光明歲月”），1999年出版的 *Rio de Erhu*（書名意譯為“二胡流韻”），2002年出版的 *Chá verde*（書名意譯為“茗”）。其翻譯作品有2004年出版的 *Poemas de uma Monografia de Macau*（書名意譯為“澳門紀略詩選”），2007年出版的 *Gao Ge Poemas*（書名意譯為“高戈詩選”），2001年出版的 *O Sol, a Lua e a Via do Fio de Seda: Uma Leitura do Yi Jing*（書名意譯“易經的閱讀：太陽、月亮和絲綢之路”）和即將出版的“舒望詩選”（*Poemas de Shu Wang*）。

三、受邀來澳門訪問的葡萄牙作家

在澳門回歸中國前，葡國政府為了保留更多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印記，特意邀請了一些著名的葡萄牙詩人和作家來澳門訪問，並以澳門為題從事創作，因此這些名家的文學作品有部分也在澳門出版。當中有歐仁尼奧·德·安德拉德（Eugénio de Andrade）、阿古斯蒂娜·貝薩·路易斯（Agustina Bessa-Luís）和若奧·亞基亞（João Aguiar, 1943 - 2010）等著名作家。筆者祇選取了現代葡國暢銷小說家若奧·亞基亞（João Aguiar）的作品來作些分析。

亞基亞以澳門為題的作品有三本：*Os Comedores de Pérolas*（書名意譯為“食珠者”，1992 出版），*O Dragão de Fumo*（書名意譯為“煙龍”，1998 出版）和 *O Tigre Sentado*（書名意譯為“伏虎”，2005 出版）。

《食珠者》和《煙龍》是一個故事的上下兩集。第一集描寫當記者的父親 Adriano 以自傳日記的形式講述他發現一個盒子內藏有一些文件，透過



晴蘭作品《澳門紀略詩選》封面



多方面的調查發現，當地的一名有名望的大慈善家黃湖（Wang wu）原來是一名販賣鴉片、人口（苦力、娼妓）的黑道中人。葡萄牙政界的一些壞分子視澳門為其搖錢樹，不時與當地的商界（黑道）合謀將錢財運回其祖家政黨作協助選舉經費；還有負責不同語種的專業記者穿插在故事當中，故事反映澳門回歸中國前的無政府混亂狀態。

第二集《煙龍》講述 Adriano 的女兒梨德（Rita）在葡萄牙離婚後，決意來澳門過新生活。在飛行途中遇上阿力山大，一位自稱到澳門營商的葡萄牙男子，其實是一名密探，被葡萄牙派去澳門調查葡國極右政黨與中國的三合會和國際犯罪組織之間的罪行。梨德在澳門教授中國學生葡國文學，但又被牽扯到一個學生的神秘組織。梨德受伏擊，遇到一名中國男子楊先生（Frederico Ian）。他拯救了她，為此二人結為知己。透過記者 Adriano 的協助，澳門警方得以瓦解犯罪組織，梨德留在澳門與楊先生一起生活，而其父 Adriano 則返回葡萄牙。故事以黑色小說特色為主，以本地的黑幫、葡萄牙法律界、政界的壞分子為題材，是一部暢銷於普羅大眾的警匪小說！《煙龍》曾被葡國拍成電視劇，將澳門鮮為人知的一面揭開，讓人看到了這個小半島唯利是圖的黑暗面。

筆者翻譯了《食珠者》的部分內容以供讀者進一步認識亞基亞的作品。在故事的結尾，一位土生葡人說了這樣的一番話：“你們不是異類，你們不是在澳門出世的半個中國人，你們不是一隻腳踏在亞洲。另一腳踏在歐洲，也不會在短時間裡失去你們的世界，你們不是活在那種祇有錢才能保住你和你的子孫的新國家。”（譯自原著頁216）。其中主角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如果不是我們親自爭取，澳門不會是顆珍珠。曾有多個世紀，葡國沒有為澳門定下一個長久明確的政治路向，祇有一個眼前短期的統治。”（譯自原著頁70）亞基亞綜合地對澳門回歸中國時透過《食珠者》表明了他的看法：你知道我對澳門想起甚麼來？（……）想起一個歷史軼事：那就是當埃及妖

后在安東尼面前，為了表示她的揮霍，就將一粒珍珠溶於醋中。”（譯自原著頁69）因此，澳門回歸中國對於葡國來講就是親手把這粒珍珠（澳門）毀掉，是一個無謂和奢侈的浪費。

20世紀以澳門為寫作題材的葡語詩人和作家約有六十位之多，筆者祇在此列出作者和其作品名稱，不再作深入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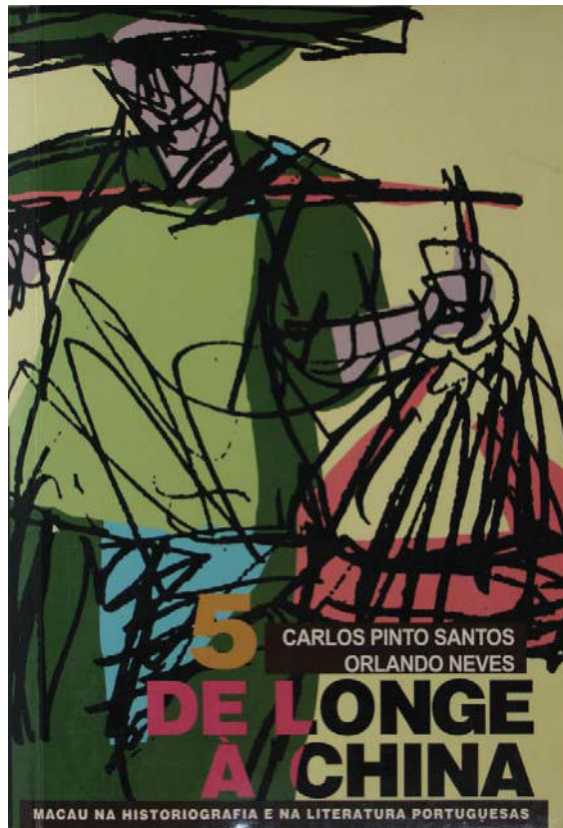
瑪利亞·安娜·阿恰約利·塔曼依尼（Maria Ana Acciaioli Tamagnini）的 *Lin Tchi Fá: Flor de Lótus*（書名意譯為“蓮之花”），1925年；阿爾瓦羅·德·梅洛·馬沙多（Álvaro de Melo Machado）的 *Coisas de Macau*（書名意譯為“澳門事物”），1913年；安東尼奧·德·聖塔·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的 *Cartas do Extremo Oriente*（書名意譯為“遠東來信”），1938年；弗朗西斯科·德·卡爾瓦略·伊·雷戈（Francisco de Carvalho e Rêgo）的 *O Caso de Tesouro do Templo de A-Má*（書名意譯為“天后廟寶藏案”），1949年，*Cartas da China*（書名意譯為“中國來信”），1949年，*Macau*（書名意譯為“澳門”），1950年，*Mui-Fá: Flor da Ameixeira*（書名意譯為“梅花”），1951年；若阿金·帕索·德·阿爾科斯（Joaquim Paço de Arços）的 *O Navio dos Mortos*（書名意譯為“死人船”），1952年，*Circulação das Memórias*（書名意譯為“回憶的流轉”）；埃爾內斯托·雷阿爾（Ernesto Leal）的 *O Homem que Comia Névoa*（書名意譯為“吃霧的人”），1964年；若澤·若阿金·蒙特羅（José Joaquim Monteiro）的 *Minha Viagem para Macau*（書名意譯為“我的澳門之行”），1939年；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的 *O Espelho do Mar*（書名意譯為“海之鏡”），1986年；若熱·李斯托帕德（Jorge Listopad）的 *Novos Territórios*（書名意譯“新界”），1986年；阿爾貝爾托·埃斯蒂馬·德·奧利維拉（Alberto Estima de Oliveira）的 *O Diálogo de Silêncio*（書名意譯為“沉默之對話”），1988年；阿爾蒂諾·德·托雅爾（Altino do Tojal）的 *Histórias de Macau*（書名意譯為“澳門故事”），1987年；若澤·瓦

勒·德·菲格雷多 (José Vale de Figueiredo) 的 *O Provedor dos Vivos* (書名意譯為“生人的供應者”)，1988年，瑪利亞·德·羅扎里奧·阿爾梅達 (Maria do Rosário Almeida) 的《珠江》(*Chü Kong*)，1987年；若熱·阿里馬爾 (Jorge Arrimar) 的 *Fonte do Lilau* (書名意譯為“阿婆井”)，1990年，*Secretos Sinais* (書名意譯為“秘密訊號”)，1992年；安東尼奧·雷波爾當·納瓦羅 (António Rebordão Navarro) 的 *As Portas do Cerco* (書名意譯為“關閘”)，1992年；安東尼奧·曼努埃爾·寇托·維安納 (António Manuel Couto Viana)、歐仁尼奧·德·安德拉德 (Eugénio de Andrade)、若譯·奧古斯托·塞阿布拉 (José Augusto Seabra)、米格爾·托爾加 (Miguel Torga)、阿古斯蒂娜·貝薩一路易斯 (Agustina Bessa-Luís)。

這些作家們發表過那些多多少少涉及澳門的作品，他們全都在澳門逗留過，時間長短不等。他們發表的觀感，同費雷拉·德·卡斯特羅 (Ferreiro de Castro)、安東尼奧·塞爾吉奧 (António Sérgio) 或阿爾諾索伯爵 (Conde de Arnoso) 的觀感大不相同，因為他們是在這個世紀末寫作的，“官方層面上的分離”日漸臨近，他們全都談到葡萄牙同澳門的關係，都說出了自己個人對現實與地方的獨特體會。

澳門回歸後的葡語文學作品

21世紀澳門回歸中國後，葡語文學作品的出版已不多見，偶然也有一些作家繼續創作 (如晴蘭)。幸好每年仍有土生土語話劇演出。及至2004年“五年五本書計劃”展開後，才又見到葡語文學作品的出版。這項計劃是為紀念特區回歸五年，由澳門發行的葡文日報《句號報》(*Ponto Final*) 與東方文萃出版社 (Livros do Oriente) 合作，邀請三位小說家和兩位記者，在該報上每週發表一篇他們的作品。他們所寫的小說，題材都以澳門為對象，內容風格各有獨特之處。當中有葡萄牙著名小說家 João Aguiar 的《伏虎》(*O Tigre Sentado*)、賈樂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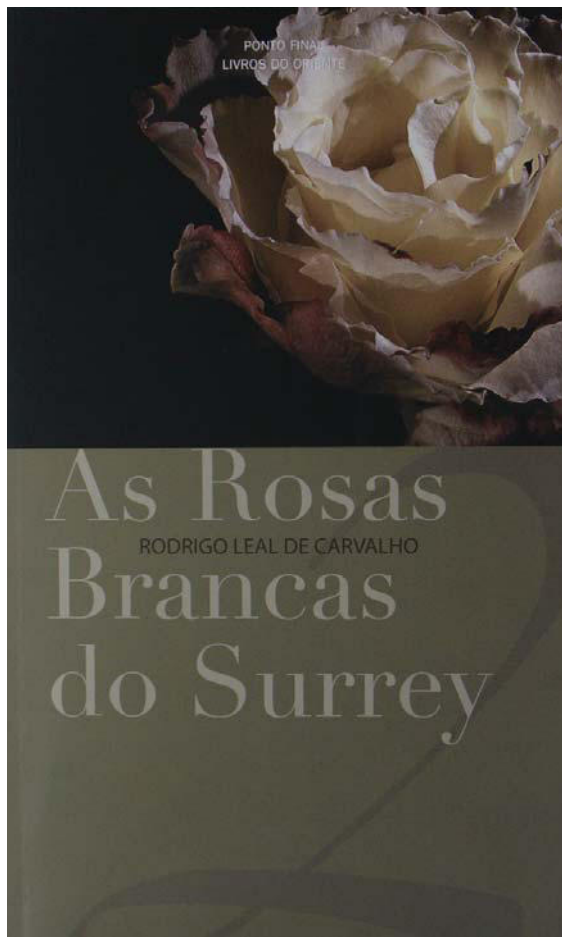
由嘉路士·山度士 (Carlos Santos) 及奧蘭度·尼維士 (Orlando Neves) 合編的第五冊《澳門葡語文學選》(*De Longe à China*)

檢察官的《舒梨郡的白玫瑰》(*As Rosas Brancas do Surrey*)、記者 João Paulo Meneses 的《澳門搖錢樹》(*A Árvore das Patacas*)、飛歷奇的遺作《黑色十二月天》(*A Noite Caiu em Dezembro*) 和 *Riveviera*。該活動原來計劃將在報章發表過的內容集結成書，預備在2005年出版，但實際上到最後祇出版了《伏虎》、《舒梨郡的白玫瑰》和《澳門搖錢樹》三本長篇小說，有些作品則成為某些作家的遺作 (飛歷奇於2010年離世，未能完成作品)。

2011年起，有部分已返回葡萄牙的文人陸續再度來到澳門。他們仍用澳門官方語言之一的葡萄牙語寫作，其作品也在澳門出版，見證了中葡之間固有的真誠友誼。筆者衷心希望，這些葡語作品能有效地向其他葡語國家推廣澳門的獨特



亞基亞作品《伏虎》封面



賈樂安作品《舒梨郡的白玫瑰》封面

文化，對澳門成為中國和葡語國家開展互利友好合作重要平臺起促進作用。

結語

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土壤孕育出來的豐碩果實，在澳門文學的花園裡應有它們生存的角落，它們完全可以成為澳門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澳門文學”這一概念有更豐富的內涵，更鮮明的特色。及時開拓澳門葡語文學研究，將四個世紀以來的澳門葡語文學納入澳門文學研究的視域，以其珍貴的文化價值來豐富“澳門文學”的形象，將是極具深遠意義的事。澳門葡語文學尤其是土生葡人文學不但可以充份體現澳

門這座珠江口海港城市的文化特色，它們甚至可能在世界文學的意義上充份展示澳門文學的獨特色彩。而對上述三種澳門葡語文學作品的蒐集研究，或可使人們瞭解澳門歷史上不同族群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豐富文化積澱，因而也將為澳門的比較文化研究領域開拓出嶄新的課題。

【註】

- (1) 洛瑞羅選編《十六和十七世紀文獻選集：伊比利亞文學視野的中國景觀》譯文引自《文化雜誌》，楊平譯，澳門文化司署，第31期，1997年版，頁12。
- (2) José Augusto Seabra: “Macau e os Poetas Portuguesas”, *Revista de Cultura*, 葡文版第15期，譯文引自若瑟·奧古貝多·薩埃布拉〈澳門和葡萄牙詩人〉，《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7期，頁125-132。
- (3) 李安樂：《Por Caminhos Solitários》，1983年版，譯文引自汪春〈澳門的土生文學〉，載於《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8年版，頁353-357。